

元明清时期天水地区的 佛教艺术

高翔 著

责任编辑 / 贾 文

装帧设计 / 马 啸

元代秦州地区佛教概况及其社会背景

秦州境内元代遗存考查

秦州地区元代佛教艺术的初步研究

明清时期秦州地区佛教概况及其社会背景

明清时期佛教艺术遗迹考查

ISBN 978-7-226-04833-7



9 787226 048337 >

定价:38.00 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明清时期天水地区的佛教艺术 / 高翔著. --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226-04833-7

I. ①元… II. ①高… III. ①佛教—宗教艺术—天水
市—元代~清代—文集 IV. ①J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3678号

出版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贾文
封面设计: 马啸

元明清时期天水地区的佛教艺术

高翔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甘肃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1.75 插页 2 字数 168千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 500

ISBN 978-7-226-04833-7

定价: 38.00元

前 言

随着佛教的传播与发展，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与衰落，随着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在秦州（现天水地区）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留下了佛教艺术兴衰的足迹。

通常我们更多的关注秦州地区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乃至宋的佛教艺术的发展演变。因为这些遗存承载着不可复制的辉煌、无法企及的传统绘画艺术的高度，满足着我们对精深的传统艺术的向往之心。

然而作为存在——元、明、清时期的佛教艺术，在见证政治、经济、文化衰落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众多欣喜。给我们展示出佛教艺术传承和发展的完整轨迹，展示出在元明清时期佛教艺术民俗化、世俗化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沉淀下来，并共同构筑秦州地区引以为自豪的地方文化。

在搜集资料和成书的过程中，得到了天水师范学院学科带头人王骁勇教授以及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孙晓峰博士、唐冲等人的鼎力支持，促成了我将这一时期遗存下来的佛教艺术汇编成册，深入解读了这段被忽略的佛教艺术。今得以出版，不足之处，乞请斧正。

高 翾

2015年6月

目 录

第一章 元代秦州地区佛教研究	001
第一节 元代秦州地区佛教概况及其社会背景	001
一、元代秦州地区的社会发展概述	001
1. 秦州的建制与变迁	001
2. 秦州地区的社会状况	003
二、元代秦州地区佛教的发展概况	006
1. 元代佛教的发展概况	006
(1) 藏传佛教	006
(2) 汉地佛教	008
(3) 元代的“三教合流”思想概述	009
2. 元代秦州地区佛教发展概况	011
第二节 秦州境内元代佛教遗存考查	012
一、麦积山石窟元代遗存	012
1. 麦积山石窟48窟造像	012
2. 麦积山石窟其他元代造像	016
二、仙人崖石窟元代遗存	021
三、武山水帘洞石窟群元代遗存	025
四、木梯寺石窟元代遗存	030
五、元代其他零星遗迹	036
第三节 秦州地区元代佛教艺术的初步研究	037
一、元代秦州地区佛教思想及其变迁	037
二、秦州地区元代佛教造像、壁画的艺术特点	042





1. 藏传佛教的影响	042
(1) 造像艺术	042
(2) 壁画艺术	044
2. 汉传佛教的传统影响	044
(1) 造像艺术	044
(2) 壁画艺术	045
第二章 明清时期秦州地区的佛教艺术	046
第一节 明清时期秦州地区佛教概况及其社会背景	046
一、明清时期秦州地区社会发展概述	046
二、明清时期秦州地区宗教发展概述	047
1. 明清佛教综述	047
2. 明清时期秦州地区佛教概况	050
第二节 明清时期秦州地区的佛教艺术遗迹考查	053
一、明清时期麦积山石窟佛教艺术遗存	053
1. 麦积山石窟明清时期的造像艺术	054
2. 麦积山石窟明清时期的壁画艺术	064
二、仙人崖石窟明清时期的佛教艺术遗存	077
1. 仙人崖明清佛教造像	077
2. 仙人崖明清佛教壁画	095
三、街子千佛洞石窟	103
四、大象山	103
五、木梯寺	104
六、八佛崖石窟	108
七、庄浪县云崖寺石窟	109
第三节 明清时期秦州地区佛教艺术的特点	112
一、明清时期秦州地区佛教造像艺术	112
二、明清时期秦州地区佛教壁画艺术	113

第三章 明清时期麦积山石窟的发展状况	115
第一节 明代麦积山石窟资料分析	115
一、成化、正德年间	115
二、嘉靖年间	117
第二节 清代麦积山石窟资料分析	123
一、“普同塔”塔铭考·兼谈圆慧和尚与乾隆时期麦积山发展概况	123
二、关于麦积山塔院之记载	124
三、塔铭内容之研究	127
四、圆慧和尚与乾隆一朝麦积山石窟之发展	131
五、麦积山瑞应寺旧藏经书所反映的几个问题	137
附 录	
一、麦积山石窟明清时期碑碣、铭文	140
1. 明代	140
2. 清代	147
二、麦积山明清文书中的僧人资料	156
三、麦积山元明清题记	162
1. 元代题记	162
2. 明代题记	164
3. 清代题记	175



第一章 元代秦州地区佛教研究

第一节 元代秦州地区佛教概况及其社会背景

一、元代秦州地区的社会发展概述

1. 秦州的建制与变迁

秦州作为行政地名，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从远古到春秋战国，从先秦两汉到魏晋南北朝，这里一直是中华民族先民繁衍生息的重要地区之一。

早在夏商周时期，天水属于雍州，西周孝王时期嬴非子在秦池（今张家川一带）为王室养马有功，被封与秦，号嬴秦，也就是后世的秦亭，这也是天水辖区见于史籍的最早地名。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秦灭邽戎和冀戎，设置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两个县级建制——邽县和冀县。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79）设立陇西郡，开始对天水地区实行郡县两级制管理。

西汉武帝元鼎三年，析陇西、北地二郡置天水郡，这是天水名称的由来。曹魏黄初元年（公元220），以陇右地区为秦非子的故地而设秦州，治上邽。这是秦州名称的开始，但是不久就撤了，并入雍州。西晋泰始五年（公元269），西晋政府再次“以雍州陇右五郡（陇西、南安、天水、略阳、武都）及凉州之金城，梁州之阴平，和七郡置秦州，治冀城（今天水市甘谷县东）。太康三年（公元282），罢秦州，并雍州。太康七年（公元286）复立，治上邽”。但其辖区远大于今天水市行政辖区，大致包括今天甘肃





省的兰州、天水、定西、陇南全境及临夏、平凉、甘南的一部分，还包括陕西的略阳、凤县，四川省的平武、九寨沟县，青海省的循化、尖扎、民和等县，总面积约11.2万平方公里，几乎是如今天水市面积的10倍。十六国时期，随着西晋政权瓦解，秦州也分崩离析，陷入战乱之中，成为当时氐、羌、羯、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政权割据争夺的战场。北魏太延二年（公元436），随着仇池氐王杨难当的归顺，秦州正式纳入北魏版图，州治上邽（今天水市秦州区，为避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讳，改“上邽”为“上封”）下辖天水、略阳、南安、汉阳、陇西等五郡18县，范围包括今天水、定西大部及平凉、白银、陇南的一部分，面积约3万多平方公里。北魏永安三年（公元530），析陇西、南安置渭州。西魏初年，再次从秦州中分置出东秦州、南秦州和北秦州，形成四个秦州并立的局面，西魏恭帝元年（公元554），东秦州改称陇州，南秦州改称成州，北秦州改成交州。至此，秦州范围大致与今天水市辖区相当。

北周立国后，鉴于北魏和西魏时期“州郡纷错”的混乱状况，再次对行政建制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并设立总管府，以总管兼所在之州刺史。这一时期秦州设总管府，下领天水、汉阳（秦州区境内）、清水、略阳（秦安陇城一带）、河阳（静宁县）5郡。

隋朝实行郡县两级管理体制。大业年间，改秦州为天水郡，下辖上邽、冀城、清水、秦岭（麦积区境内）、陇城、成纪（静宁县内）等6县。

唐代行政建置包括道、州、郡、府、县等，其中道作为监察区是一个虚级，州、郡、府则视不同地区而设，属同一级行政机构。因此，实质上仍是州（郡）、府和县两级管理体制。当时天水属陇右道秦州，下辖上邽、成纪、陇城、清水、伏羌（甘谷）等5县。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驻守陇右的大批唐军东调平叛，长期与之对峙的吐蕃政权则趁机攻占了陇右、河西地区。从此，陇右一带被吐蕃控制，直到大中三年（公元849），乘吐蕃内讪，唐朝政府才再度收复包括秦州在内的陇右地区。唐朝末年，李茂贞父子建立起割据陇东南的秦岐政权，开始长达60年的统治。公元

915年，在后蜀、后梁政权的进攻之下，秦岐政权灭亡。秦州又相继被梁、晋、汉、周等五代时期的政权所控制。

北宋地方行政体制以路下辖州、县两级管理方式为主。同时，与州平行的还有府、军、监等设置。当时天水属秦凤路管辖下的秦州天水郡，雄武军节度。其中秦州下辖成纪、陇城、清水、天水4县。北宋末年，随着金军大举南下，陇右一带都被金军占领。南宋建立后，根据宋金之间的划界协议，秦州大部分属金设置的巩昌府管辖，下辖秦安、鸡川、陇城、治坊、清水、成纪6县。

元朝建立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在地方设立行省制度，省下依次设路、府、州、县四级管理体制，当时天水属陕西行省巩昌路都总元帅府管辖下的秦州，下辖成纪、秦安、清水3县。

明代时撤销行省，天水一带属陕西布政司秦州，下辖秦安、清水、礼县3县。

清初地方机构设置沿袭元代，但官职上则按明法分省、府、县三级，秦州被升格为直隶州，下辖秦安、清水、礼县、徽县、两当5县，改隶新设置的甘肃布政司管理。

本书所述的石窟，其地理位置以当下的行政区划为参照。各个历史时期所述的社会发展概况与佛教艺术的发展状况均以各个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划为参照。

2. 秦州地区的社会状况

南宋时期，秦州一带就是一个战略重地，宋金之间在这里进行了长期的拉锯战。在元朝统一华夏的战争中，元朝统治者的战争策略是先灭西夏和金、次西南大理国、最后为南宋。这样，关陇地区自然成为蒙古铁骑首当其冲的经略对象。当时的秦州已被金吞并，隶属金巩昌便宜总帅府管辖，元至正四年（公元1227），蒙古灭西夏，大军攻入金境，破临洮府及洮河、西宁、镇戎等州。“所在残灭，饥疫渐臻”，军民皆弃城郭而保山险，金巩昌便宜总帅完颜仲德行省设于巩昌府，招集熙河、庆阳等二十四





城散亡将卒数万，依险壁石门山，他号令严明，治军严谨；又率领部属屯田积谷，四方流民多有归附。此时，世居陇右巩昌府盐川镇（今定西漳县）的吐蕃豪酋首领汪世显在其帐下担任巩昌府同知兼参议帅府机务。正大九年（公元1232），蒙古军围攻汴京，完颜仲德率三千人入援，汪世显权假巩昌便宜都总帅。但汪氏与金秦州元帅粘葛完展不和，遂起兵攻杀之，并占据了秦巩等二十四城。天兴三年（公元1234），乘金初亡之际，汪世显又攻杀了巩昌粘葛完展，完全占据了巩昌府，自称巩昌府便宜总帅。元太宗七年（公元1235），皇子阔端率军攻到巩昌城下，汪世显审时度势，为保陇右数十万军民免遭涂炭，遂率部出城投降。阔端权其“仍官以便宜都总帅，凡其前所节二十四城还受节度”，这样一来，包括天水在内的陇右一带正式纳入元朝版图。

如前所述，金元以来，世居陇西盐川镇（甘肃漳县）的汪氏家族以武功起家，称雄陇右。端平二年（公元1235），率部归降元朝的汪世显仍为便宜都总帅，甘肃中、东部尽归巩昌路便宜都总帅府管辖。元代在西北地区设置有陕西、甘肃两个行中书省，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元初巩昌路便宜都总帅府巩昌府下辖巩昌、平凉、临洮、庆阳、隆庆五府，及秦、陇、会、环、金、德顺、徽、金洋、安西、河、洮、岷、利、巴、沔、龙、大安、褒、泾、邠、宁、定西、镇原、阶、成、西和、兰等27州。其中天水市辖区分属陕西行中书省巩昌都总帅府管辖下的巩昌府（领陇西、宁远、伏羌、通渭、郿县等5县）和秦州（领成纪、清水、秦安等3县）两部分，巩昌府辖下的宁远和伏羌即分别为今天的天水市武山县和甘谷县。

元代由于民族征服战争和客观地理条件的影响，西北地区的农业除关中地区较为发达外，当时的陕西、甘肃境内在整体上还是“地瘠民贫”，如元代中期的纳粮，陕西为22万石，甘肃6万石，而江浙一省即达450万石；从人口数量上看，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元初巩昌府户45135，口369272。其中巩昌府辖下的伏羌、宁远二县大约有4700余户、4万人。据《牧庵集》卷21《李公神道碑》记载，公元1235年秦州归蒙古时户万家、

口10万，且元代秦州为中等州，推算元初秦州可能有1万余户，10万多人口。再加上巩昌府的伏羌与宁远两县人口，估计当时天水境内人口约15万。

在民族构成上，天水境内主要有吐蕃、汉、蒙古、回和契丹等民族。早在宋代时，许多吐蕃部落就散居在秦凤、泾原二路，其中又以秦凤路辖下的秦州吐蕃部族最为强盛，他们主要居住在今天的武山、甘谷、清水一带。此后，在宋、金、蒙古之间的战争中，也有部分契丹人和蒙古人迁入秦州地区。

自古以来，天水就是中原地区与西北少数民族进行茶马贸易的重要地区之一。到元代时，这一地区的对外贸易依然非常兴盛，如秦州区的皂角镇成为当时秦州商品与由长江支流汉江与嘉陵江水路北上的商品交易的集散地。据《大元一统志》记载：“皂角堡，水榷场也，下视秦州赤谷。”在天水市麦积区文化馆收藏一件元代铜权，高10厘米，桥形钮，广肩，束腰，叠涩座，平底，腹部阴刻铭文“大德九年（公元1305）兴元路照造”9字。兴元路治南郑，管辖今陕南大部分地方。这枚铜权反映了当时天水与陕南地区的经济贸易往来依然频繁，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天水与全国其他地方经济往来的状况。在今天水市秦州区平南镇关同村云雾山北麓的泰山庙，曾发现一块至大元年（公元1308）立的石碑。记录了一名巴蜀商人从四川出发至河西经商，途经官屯岭东岱行祠时突发腹痛，向行祠供奉的东岳泰山神许愿，腹痛神奇痊愈，数年后经商成功返回四川老家。后来，他于至大元年捐资重修东岱行祠并立石为记。云雾山北麓泰山庙元碑，是一件反映陇蜀交通与商贸往来的珍贵史料。

天水地区除传统的农耕文化外，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元代时也非常突出，成为连接关陇、河西和巴蜀的交通要道。从关中地区的汧河向西翻越陇山，渡黄河后可达河西，其途经天水的主要驿站有张家川境内的故关站（今甘肃张川县站坪门）、秦亭站（今甘肃张川县秦亭镇）和麦积区境内的社树坪站（今甘肃天水市麦积区社堂镇）等。通过这些驿道，不仅促进了





天水地区经济贸易的交流和繁荣，而且也加速了当时的各种宗教文化在当地的传播。如根据学者考证，今天居住在天水市秦州区窝驼村的回族居民，其祖先可能就是元代时来到天水的中亚商人，而始建于元至正三年（公元1343）的秦城区西关清真寺，大概就与这批来华经商的中亚商人有关，同时也是伊斯兰教传入天水的标志之一。

二、元代秦州地区佛教的发展概况

1. 元代佛教的发展概况

从公元1206年开始，蒙古铁骑在成吉思汗、窝阔台、蒙哥、忽必烈等历代可汗的带领下，建立起号称“北逾阴山，西及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元政府推行自由、开放的宗教政策。不但规定各宗教的寺院庙观不得随意骚扰，免除各教人士的差发赋税，还经常举行盛大的宗教活动。在其保护下，宗教人士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下，各种教派得到了较快发展，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佛教、道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元代，僧侣被统称为和尚，道士称为先生，基督教徒称也里可温，伊斯兰教徒称答失蛮，其管理机构依次为宣政院、集贤院、崇福司、回回哈的所。现仅就佛教略加以概述。

（1）藏传佛教

元代的佛教非常兴盛，其中藏传佛教占据着重要地位。当时全国的寺院根据宣政院统计，到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共有寺院42000余所，登记在册的僧尼有21.3万人，到元代中叶，僧尼总数约有百万人。关于蒙古统治者最初接受的佛教，学术界比较统一的看法应是中原禅宗。根据相关佛教典籍记载，1214年，蒙古军队攻占宁远（山西五寨县）时，13岁的禅僧海云，曾于“稠人中亲面圣颜”。1219年，成吉思汗在西域传诏，命海云及其师弟中观统汉地僧人，免其差发。还赐予海云“告天人”称号，其前海云印简受太宗、定宗、宪宗、世祖四代的重用，曾为忽必烈之子摩顶立名，取名真金，开蒙古王子取汉名之先河。

他的弟子刘秉忠为元代著名政治家，曾拜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公元1242年，海云又北觐忽必烈，说佛法大意。在他的影响下，忽必烈带头崇佛，于“万机之暇，自持数珠，课诵、施食”。公元1261年，还下诏建大乾元寺、龙光华寺。公元1285年，“发诸卫军六千八百人，给护国寺修道”。公元1285年，忽必烈亲于西京普恩寺集全国僧侣四万人举行资戒会七日，并令帝师于各大寺庙做佛事十九会，他还曾对群臣说：“自有天下，寺院田产，二税尽蠲免之，并令缁侣安心办道。”此后的元朝诸帝在大都依此办理，如成宗时期就大建寺院、广施财物。据大略统计，自元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到至正七年（公元1347），前后共给寺田“三千二百八十六万一千亩”，使佛教获得很大发展。

早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统治者就试图将藏传佛教作为联系西藏上层的重要纽带，公元1247年，蒙古阔端太子（成吉思汗之孙）在凉州（今甘肃武威）会见西藏萨迦派宗教领袖萨班，成功地解决了西藏的归属问题，这也是蒙古王室与西藏上层建立关系的开始。在萨班死后，他的侄儿八思巴成为萨迦派教主，同时，也成为西藏地方势力与元朝建立联系的关键人物。忽必烈继位后，将八思巴召至左右，从受佛戒。八思巴曾为忽必烈夫妇等25人传授秘密戒法及四种灌顶。后被尊为“国师”，并赐玉印，后又被升为“帝师”，领总制院，管理全国佛教及藏族地区事务，成为统领天下释教的最高僧官。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总制院改称宣政院，置院使、同知、副使、参议、经历、都事、管勾、照磨等官，扩大了管理职权；除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外，又兼管藏族地区的军政事务及西藏的十三万户，与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并列，是中央政权中互不统属而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四个机构之一。从八思巴开端，终元一代，历朝都以“喇嘛”（藏传佛教僧侣）为帝师，新帝在继位前，必先就帝师受戒。由此可以看出，帝师不仅是藏传佛教和西藏地方的领袖，也是全国佛教的首脑，同时也是元中央政府的重要官员，拥有巨大的影响和实权。此外，元政府还在杭州设置江南释教总统所，任命“喇嘛”统理，直接管理江南佛教，后并





入宣政院。这样，藏传佛教就统治了全国佛教，享有种种特殊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如宣政院就规定：“凡民殴西僧者，截其手；骂之者，断其舌。”藏传佛教上层在元朝已成为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当中的部分人飞扬跋扈、抢掠财物、残害民众、为害一方，加剧了当时的社会 and 民族矛盾。

(2) 汉地佛教

元朝诸帝在重视藏传佛教的同时，也不排斥汉地佛教。就全国的佛教情况而言，禅宗最为兴盛。其中北方地区以万松行秀、雪庭福裕一系的曹洞宗和海云印简一系的临济宗势力最为强盛。南方地区以云峰妙高、雪岩祖钦、中峰明本等临济宗禅师的活动为主。总的看来，曹洞宗盛于北方，临济宗盛于南方。元初佛教界一些著名人物，如耶律楚材、刘秉忠等，或为朝廷所尊信，或居政府的要职，对于当时佛教的护持，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此外，净土宗、天台宗、慈恩宗、华严宗等仍然继续传播。潜心研究佛学和讲学著书之风大兴，治学有成而被召至京师或委以重任者也不乏其人。

元代汉族僧尼和少数民族僧人一样受到政府的优礼，特别是禅宗和净土宗，都普遍流行；著名僧人刘秉忠就曾拜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元朝在京都和各地都建有很多官寺，又将大量田地赐作寺产，建立专门的官署来经营管理寺院经济。在西北汉族地区，根据统计，陕西、甘肃两省境内共有寺院500余所。其中多为私人修建，其规模和经济实力较小，与同时期的西北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由于政府物质利益的诱导，元代佛教走上了世俗化的道路。其特征主要表现为，一是寺院经济空前壮大。各寺院大规模经营农牧业、当铺、酒店、货仓、旅馆、商店等，这一普遍性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元政府财政收入和赋役来源。因此，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五月，元政府“敕僧寺之邸店、商舍止，其货物依例收税”。后来更明令要求僧、道为工商者纳税。二是世俗化明显，元代从西北到内地去的藏族僧人，多是从事政治、经商活动，专为传教者甚少，这缘于其师徒个人秘传的方式。三是汉